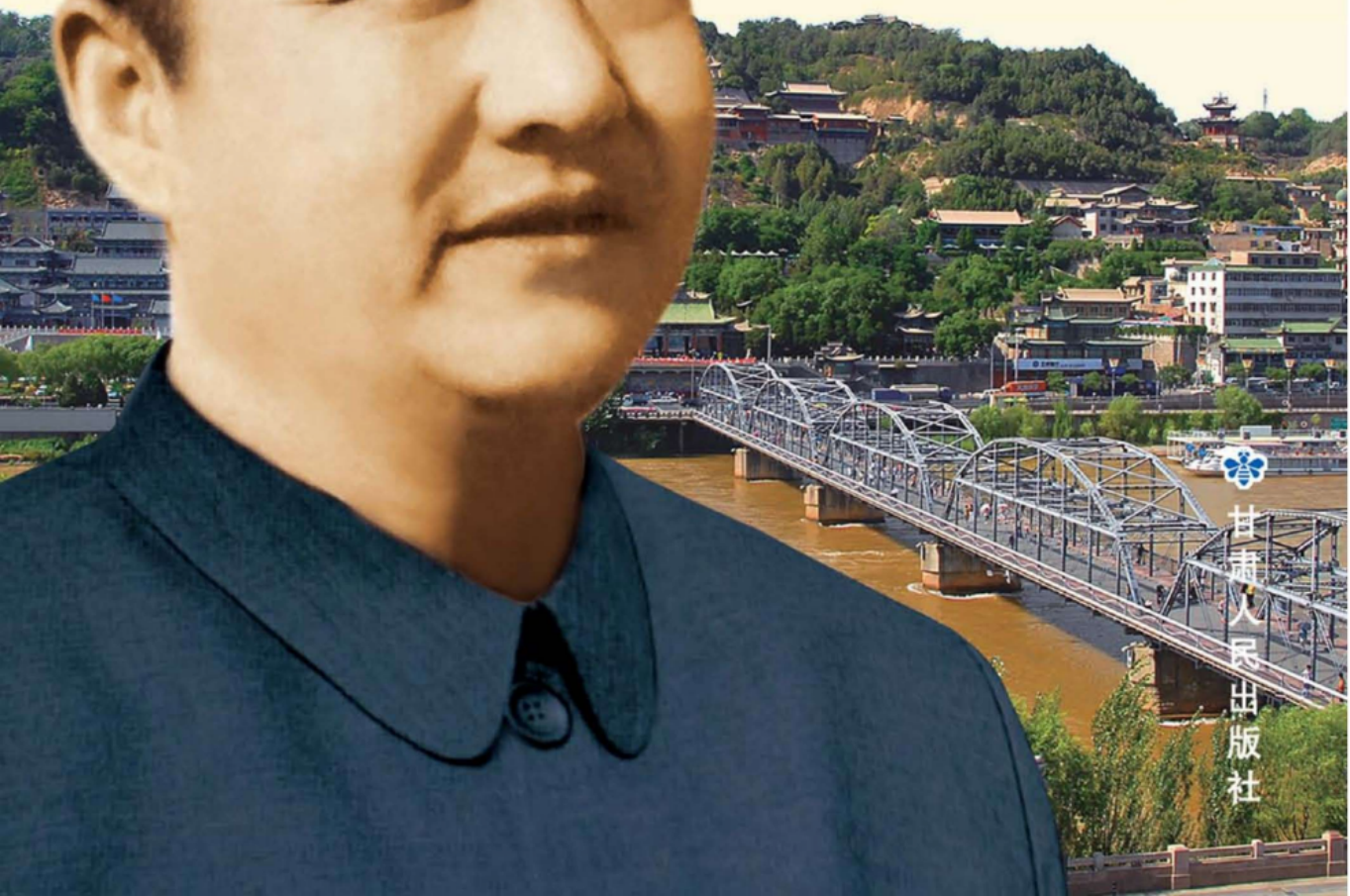


习仲勋与甘肃

中共甘肃省委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26-04117-8



9 787226 041178 >

定价: 298.00 元

习仲勋与甘肃

中共甘肃省委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习仲勋与甘肃 / 中共甘肃省委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226-04117-8

I. ①习… II. ①中… III. ①甘肃省-党史
资料 IV. ①K2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295178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牟克杰
装帧设计: 李玉兰

习仲勋与甘肃

中共甘肃省委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38.5 插页40 字数626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226-04117-8 定价: 298.00元

《习仲勋与甘肃》编委会

主 任：王三运 刘伟平

常务副主任：欧阳坚

副 主 任：连 辑 吴德刚
泽巴足 傅传玉

主 编：杨元忠

副 主 编：吉西平 伏晓春

编 辑：韦思军 李 赞 李玉兰
魏洁庆 戴引兄 张慧莉
贾玉婷





光辉业绩彪炳陇原 崇高风范励志后人

——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

《习仲勋与甘肃》编委会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和西北局的主要领导者，他在陇原大地留下光辉战斗的足迹，与甘肃人民结下深厚情谊。

1930年春，青年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打入国民党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到1931年，已在杨虎城部警备第3旅2团1营中秘密建立起中共组织、任营委书记。1932年4月，习仲勋和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刘林圃等，率移驻甘肃两当县的1营举行武装兵变。兵变部队300多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5支队，习仲勋任队党委书记。兵变部队在甘陕两省千里转战，唤起了陇原人民革命斗争的热情。两当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发动的一次武装革命行动，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当局，点燃了甘肃武装革命的燎原之火。兵运工作和组织发动兵变的过



程，不仅培养了一批党的骨干分子，也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以两当兵变为标志，习仲勋由一名坚定而有远见的革命战士成长为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优秀军事指挥员。

两当兵变之后，经党组织安排，习仲勋找到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认真总结历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心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先后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他积极配合刘志丹、谢子长，组织发动群众，创建红色政权和军事组织，表现出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1933年8月，习仲勋作为执行主席之一，在陕西耀县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刘志丹等红26军主要领导人身陷终南山未归的情况下，习仲勋从革命大局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这一正确主张，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陷后，1933年11月，陕甘边党政军组织又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讨论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和军事斗争问题。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正确主张下，会议做出了整军、建政、开辟三个军事游击区的重大决策，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甘肃华池县南梁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在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他主持制定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施政内容的“十大政策”，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展做出艰辛努力；他全力维护刘志丹等人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在不断排除内部“左”右倾思想干扰中扩大了党组织，壮大了红军武装。他参与领导了苏区的游击战争，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连成一片，地域扩大到横跨甘陕两省的数十个县，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

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在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向西北转移的关键阶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意义十分巨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过高度评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积极探索建党、兴政、强军三者有效结合的路子；在军事斗争中坚持“狡兔三窟”机动灵活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求生存求发展，不断拓展了根据地发展壮大空间；在政权建设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陕甘地区共产党人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发展、保存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5年10月，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人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制止了这场错误肃反，释放了被关押的干部，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6月，习仲勋任环县县委书记。他组织领导群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壮大党组织，建立新政权，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1936年9月至1942年2月，习仲勋担任关中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出色完成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任务。他模范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他领导关中分区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政权建设。在选举产生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广泛吸收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共产党员仅占三分之一。这种新的民主政权形式，为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抗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动



员关中分区党政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分区从严重的财经困难中解脱出来，保障了军队给养和人民生活。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予以表彰。

从1943年2月开始到党的七大召开后，习仲勋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担负起领导占陕甘宁边区三分之一人口的历史重任，守卫边区北大门三年。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使绥德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先进。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模范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成熟的革命领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职。在西北局领导岗位上，习仲勋大力支持新恢复成立的甘工委开展工作，精心指导甘工委发展党组织，培养干部，在国统区建立两面政权和隐蔽武装，为迎接解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946年7月，习仲勋组织召开西北局甘肃工作会议，讨论甘肃国统区工作发展的方针和任务，要求甘工委继续大力开展暗政权建设，扩大武装力量，开辟新的陇南根据地。西北局甘肃工作会议，是一次对甘肃国统区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会议。会后短短两年时间，甘工委从恢复陇南、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到建立陇渭工委、平东工委、海固工委、皋榆工委，使甘肃地下党组织扩大到除河西以外的广大地区，为甘肃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军事斗争中，习仲勋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彭德怀、贺龙密切配合，组织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围绕实

施“陇东战役”、“兰州战役”，组织开展军事动员和后勤保障等工作，保证西北野战兵团战胜了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为甘肃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1947年3月，时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的习仲勋，和司令员张宗逊指挥部队取得西华池战斗胜利，给进犯的胡宗南整编48旅以歼灭性打击，为延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5月下旬，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发动陇东战役，沉重打击了“青马”和“宁马”部队，收复了解放区大部分失地。1949年8月，兰州战役打响后，习仲勋亲临部队西进一线，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组成一支10万多人的支前大军，有力地保障了第一野战军在较短时期内合围兰州任务的完成。兰州战役的胜利和甘肃全境解放，凝聚着习仲勋同志超强的政治斗争智慧和组织领导才能，他光辉战斗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亲和感人的形象永远留在甘肃人民心中。

新中国建立初期，习仲勋主政西北，部署建立甘肃新政权，恢复经济社会新秩序，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为甘肃各项事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省份，历史上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和矛盾相当严重。习仲勋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习仲勋倡导的“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为甘肃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稳定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思想。习仲勋与甘肃的许多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如邓宝珊、杨思、马鸿宾、黄正清等，长期接触，亲密合作，肝胆相照，结为挚友。这些党外民主人士和民族宗教人士在习仲勋的关心帮助下，积极发挥作用，为甘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民族宗教工作做出重要贡献。

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任务。习仲勋敏锐地认识到甘肃土改工作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也是西北地区土改工作的



重心。他要求甘肃土改工作严格执行政策，防止有偏向。针对甘肃土改中出现的偏向性问题，他及时给予纠正。提出不论“左”的或右的倾向都要及时觉察，有偏必纠。指示土改工作中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坚决团结中农，对地主阶级区别对待，妥善处理了民族、宗教、阶级三者之间的关系与问题，保证了甘肃土改工作的健康发展。甘肃临夏地区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在临夏土改中，他强调做法要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特别是在工作的方法步骤上有区别；要求工作更加谨慎，更加细致，争取多数，打击少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他对甘肃土改工作的深思熟虑和正确指导，表现出他娴熟驾驭全局的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以后，习仲勋仍然十分关注甘肃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9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到甘肃考察期间，对敦煌县实行“一县一社”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全供给制分配制度等不符合客观条件的“超前”做法表示质疑；对当时既无电力资源、又无先进机械化设备，未经科学论证、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的“引洮上山”工程表示出极大忧虑，认为不切实际的做法必然会造成大的浪费和损失。1959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收到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室送来的静宁县反映严重缺粮问题的群众来信和随信寄来的一包“食物”（糠菜），感到情况非常严重，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随后，他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负责人专项研究，安排部署从陕西、四川、宁夏等地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使甘肃部分地区群众严重缺粮的局面得到缓解。此后，习仲勋多次把曾经给他担任过警卫员的华池县林镇乡农民王殿斌邀请到北京，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and 经济建设情况，关心老区人民的实际困难，帮助改变贫困面貌。他务实亲民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教育了甘肃的干部群众。

习仲勋十分关心甘肃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1983年3月，中央调整甘肃领导班子。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召集甘肃省委11名同志就调整甘肃省领导班子进行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同志们在一起工作，要经常互相提醒，互相支持。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党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靠发挥集体的作用。”“新班子定了以后，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融洽的、生动活泼的、民主团结的局面。”

习仲勋十分重视甘肃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1985年，拉卜楞寺大经堂不幸被火焚毁。6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专门听取了嘉木样活佛和贡唐仓关于拉卜楞寺大经堂失火一事的汇报。他指出：“大经堂着火，肯定对群众影响很大，一定要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并指示大经堂照原来的样子重新修建。在习仲勋的关怀下，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投资1200万元，重建了拉卜楞寺大经堂。1990年7月25日开光庆典之际，习仲勋发来贺信，强调指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一贯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要长期坚持和贯彻执行。”习仲勋对甘肃人民的深情厚意永远铭刻在2600万陇原儿女的心中。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习仲勋同志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坦荡，志向高远，百折不挠。他光辉奋斗的一生，充分昭示出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与人生价值，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伟大的精神风范，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在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他光辉战斗的革命历程，缅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从这位根植西部黄土高原，在艰苦环境和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实干家身上，学习美德，学习境界，学习思想，学习作风，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执政



能力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前，甘肃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省各级党组织正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动力，全面落实“十二五”规划，以坚定豪迈的步伐向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目标迈进。我们要把纪念习仲勋同志100周年活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同心同德，开拓进取，为开创甘肃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甘肃省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 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



2013年10月9日上午,甘肃省在陇南市两当县举行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暨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习仲勋之子习远平,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周涛,陕西省委副书记孙清云,分别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习仲勋同志的生平事迹和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图为座谈会会场。

两当兵变的重要影响和历史 意义学术研讨会



2013年10月9日下午,甘肃省在陇南市两当县举行两当兵变的重要影响和历史意义学术研讨会。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欧阳坚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分别讲话。图为学术研讨会会场。



在甘肃省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暨 两当兵变历史地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三运
(2013年10月9日)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讲话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

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与甘肃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甘肃作为习仲勋同志浴血奋战、屡建功业的省份，陇原大地见证了他的丰功伟绩，陇原儿女传颂着他的革命精神。我们作为甘肃的一员，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们满怀敬仰和思念之情，在这里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回顾他的奋斗历程，缅怀他的光辉业绩，追思他的崇高风范，学习他的优秀品质，重温两当兵变的革命历史，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谨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向所有参加过两当兵变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同志，向为革命事业作出牺牲和贡献的老区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革命前辈的后代，向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中央有关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兰州军